

从“描写”到“规范”

——《汉语大字典》修订中的义项增删与当代汉语词汇知识库的建构

沈士博¹ 熊灿¹ 张程^{1*}

(1.成都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 本研究以《汉语大字典》第一版与第二版为核心研究对象, 通过对642条新增义项与96条删减记录的全量系统对比, 揭示其修订的内在逻辑与深层动因, 探讨大型历时性语文辞书在现代性转型中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命题。研究采用逐字对比的穷尽性方法, 建立涵盖字头、语义类别、时代分布等维度的封闭性数据库, 综合运用计量统计、历时比较、个案深描等手段, 从语言本体(语义、语法、语音)与外部社会文化双维度展开分析。

关键词: 汉语大字典; 义项增删; 辞书修订; 汉语词汇系统

基金项目: 成都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202511079013)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3.555

From Descriptiveness to Prescriptiveness: The Addition and Deletion of Lexical Senses in the Revision of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xical Knowledge Bas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hen Shibo¹, Xiong Can¹, Zhang Cheng^{1*}

1.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f Chengdu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106,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1st Edition and the 2nd Edition of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as its core research object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642 newly added lexical senses and 96 deletion records, it reveals the inherent logic and underlying motivations for its revision, and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positions confronted by large-scale diachronic Chinese dictionaries in their modern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adopts an exhaustive character-by-character comparison method, constructs a closed database covering dimensions such as head characters, semantic categories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employs approaches including quantitative statistics, diachronic comparison and in-depth case description to conduct an analysis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 ontology (semantics, syntax, phonetics) and external social culture.

Keywords: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Addition and Deletion of Lexical Senses; Dictionary Revision; Chinese Lexical System

作者简介: 沈士博(2005—),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中外语言文化比较;

熊 灿(2006—),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汉语汉字文化;

张 程(1990—), 男,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汉语词类、海外汉文研究、认知语言学。

通讯作者: 张程

一、引言

《汉语大字典》作为我国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语文工具书，是汉字研究与辞书编纂领域的权威著作。2010年出版的第二版在第一版基础上，对字形、释义、书证等核心内容进行了全面修订完善，但随着汉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出土文献的持续新发现，以及方言用字、民族用字等专题研究的推进，其在义项设置、字词关系界定、特殊用字规范收录等方面仍有可商榷之处。辞书中字词关系的精准界定、义项的科学设置关乎工具书的权威性与实用价值，因此开展其义项增删专项研究，对完善辞书编纂体系、深化汉语词汇史与文字学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自第二版问世以来，学界围绕其修订展开多维度研究，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字形辨误、注音校正、释义补苴、书证指瑕等基础层面，涵盖体例规范、条目编排、疑难字考释等方向，部分研究聚焦特定部首字类、异体字、通假字及方言字展开探讨，为后续校勘与修订提供了具体参考。但现有研究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缺乏对义项增删、

二、新增义项的分布与动因分析

(一) 新增义项类型分布

本文通过图表直观呈现《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新增义项的类型构成与占比特征，核心反映：其一，新增义项以引申义、通假义、外来义、专业术语义为核心类别，类型分布多元且有明确主次；其二，引申义占比居首，凸显汉语词汇系统内部语义演变是义项新增的主导动因；其三，通假义类占比可观，体现修订对古文字用字规律与字际关系的考据补正；其四，外来义、专业术语义均有相应占比，印证语言接触、科技发展、专业术语规范化等外部因素的重要推动作用；其五，整体分布格局清晰展现义项新增是汉语内部自我完善与外部社会文化动因协同作用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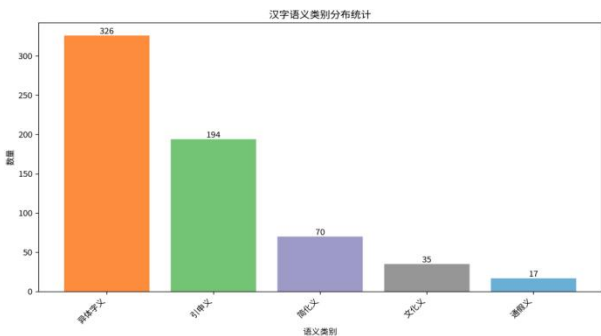


图1 新增义项语义类别分布统计柱状图

字词关系界定的系统性、全量性对比分析，通假与异体关系混淆等核心问题未得到全面梳理；二是对修订逻辑的深层探讨薄弱，未充分结合文献互证及语言内外变迁视角解读修订动因；三是方言字、民族字相关专题研究有短板，缺乏跨字典对比与长效修订机制探讨，尚未形成全面系统观照，存在明显研究空白。

基于此，本研究以《汉语大字典》第一版与第二版为核心研究对象，围绕两版间的义项修订展开系统研究，聚焦义项增删这一核心环节，旨在明确两大核心问题：第二版义项增删的具体类型有哪些？其背后的形成动因与运作机制为何？为解答上述问题，本研究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结合、宏观统计与微观个案互证的思路，采用逐字穷尽性对比、计量统计、历时比较、个案深描等方法展开分析，以期揭示义项增删的内在规律，为《汉语大字典》后续修订及当代汉语词汇知识库建构提供切实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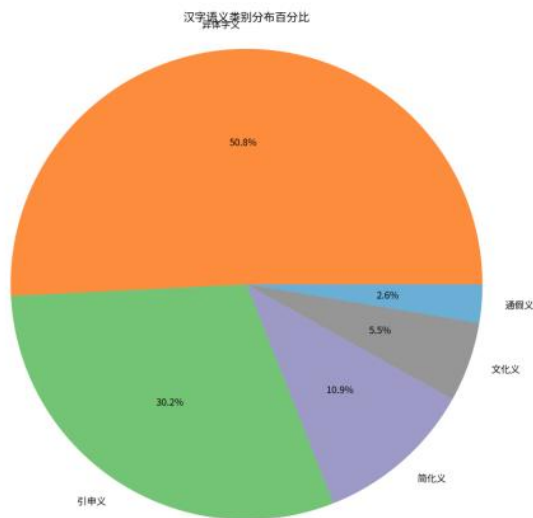


图2 新增义项语义类别分布占比统计饼状图

(二) 新增义项的类型分析

2.2.1、词义系统的自我完善

词义的系统性强调词义之间的联系性。王力先生曾经指出：人们很容易体会到一种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却往往忽视了词汇的系统性，其实词与词之间联系是十分密切的。洪成玉认为：“词汇系统实际上就是词义的结构系统。词义的结构系统表现为词义之间的各种联系形式”^[1]。武占坤、王勤认为，由于词汇的组织形式比语音、语法松散得多，个体符号之间的制约性比较弱，给个体符号的增减以较大的自由。

因此,汉语词汇系统对新成分的加入开放性强,对旧成分的脱落封锁性弱,词义与词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语的词汇系统就是以词之前的这种相互关系为基础才得以形成的。

词义系统具有较强的自我完善能力有两个原因,从客观上,词义作为语义的最基本单位,将客观世界的各种联系和系统性反映到意识之中,使得词义具有系统性,这种系统性为词义系统的自我完善提供了基础。从主观上,受人类思维的概括性和整合性的影响,人类在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会对新出现的事物、现象等进行概括和分类,赋予其新的词义,同时也会对已有的词义进行调整和完善,以更好地适应认知和交流的需要,从而推动词义系统不断自我完善。例如:汉语大字典第二版补充第一版漏收的引申义,如“下”的“鄙视”义“之”的“生长,滋生”义,语法功能义,如“甚”作“什么”“壹”作“稍,暂”。

2.2.2、语言接触与外来概念的融入

语言接触提供了新的概念和表达需求,促使外来概念融入,外来概念融入促使义项新增。语言接触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直接接触如:相邻民族间交流,间接接触如:通过媒体、文学作品等非直接人际交流。在语言接触中,不同语言使用者交流,会带来外来概念。像广州地区古粤语(今壮语)为底层融合外来移民语言形成今粤语,这一过程中就有外来概念融入。如:第二版中新增“粢”的“一种食品。将糯米掺和粳米,用冷水浸泡,沥干后煮熟,中间裹油条等捏成饭团。”“郎”的名词意“屎壳郎”在方言文化调研中,挖掘出“郎”在中国北方地方语境对“蜣螂”的俗称用法

外来概念融入使得义项新增:汉外语言接触中,汉语吸收外来词时,一些固有词语会吸收对应外语词的义项,使汉语词语增添新义项,丰富词义系统。例如汉语新词汇“宅”。“宅”字来源于日语文化中“御宅族”的引进,“御宅族”通常指那些整体待在家里,依赖电脑和网络的人(汪靖 顾晓晨,2008)。而文化被引进后,汉语词汇中并没有对应表示此意义的词汇,新词汇“宅”便诞生了。“宅”这一指代“住宅”的词汇就增加了新词义“御宅族”^[1]。“酷”从本义的“寒冷”“程度深”“严厉”新增“厉害”“时尚”的义项,这是受英语 cool 的影响。“Cool”本义也是“凉的”,在 20 世纪美国青年文化中,cool 发生了语义引申,从“冷静、不激动”引申

为“沉稳、有范儿、不做作”再进一步引申为“时髦、帅气、令人佩服”最终形成了正面评价、夸赞人/事物时尚、厉害的核心义项。这一用法随流行音乐、电影、时尚、青年亚文化扩散到全球,成为跨文化通用的赞美词。汉语在与英语接触过程中,并非简单音译,而是采用了语义借用(借义)方式:找到汉语中与 cool 本义相近的词:

“酷”,直接把英语 cool 的新引申义移植到“酷”身上,让“酷”在保留原有词义的基础上,新增了赞美义。变革和外来文化涌入中原时,也会使汉语词汇义项增加,这体现了外来概念融入对义项新增的推动。

2.2.3、专门领域术语的规范化

专门领域术语的规范化,是指在科学、技术、法律、医学、经济等专业领域中,对概念、名称、定义进行统一、明确、系统的整理与确立。这一过程不仅是整理旧义,更是催生新义,其促进《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义项新增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几方面:专业概念细化,推动词义分化。如:“艇”的新增名词义“排水量在 500 吨以下的军用船只。但潜艇不论吨位大小,均称艇”,这反映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填补专业空白,创造全新的义项。许多专业概念是现代科学与技术发展产生的全新事物、全新关系,日常语言中没有对应表达。术语规范化为这些新概念命名或赋予旧词新义,直接创造出原本不存在的义项。如:“盖”的新增名词意“农具名又名‘耒’或‘耨’。长方形,用荆条或藤条编成,用来平整地面或松田保墒”,这反映生产工具的发展。跨学科交流推动词义扩展与迁移。现代学科高度交叉,术语规范化常需要借用其他领域的成熟术语。一个词在原领域有本义,被借用到新领域并规范化后,就会新增一个跨学科义项。例如:“翼”的新增名词意为“飞机等飞行器两侧伸出像鸟翼的部分”这反映时代科技的发展,赋予旧词新义专门领域术语的规范化,推动了词语义项的分化、扩展与新增,是词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专门领域术语的规范化也体现了文献发掘与学术进步:基于新出土文献或古籍整理成果增加的古义(如“ ”同“削”)。

2.2.4、汉字简化与异体字整理的产物

汉字简化与异体字整理,通过字形合并、词义归并、用法规范,打破了原有的形义平衡。它不仅没有减少意义,反而通过词义负载加重、使用频率提升、职能分工细化,极大地促进了词语义项的分化、叠加与新增,是现代汉语词义丰富

化的重要文字动因，如简化字（如“ ”“ ”“ ”）的正式收录。

（三）新增义项的动因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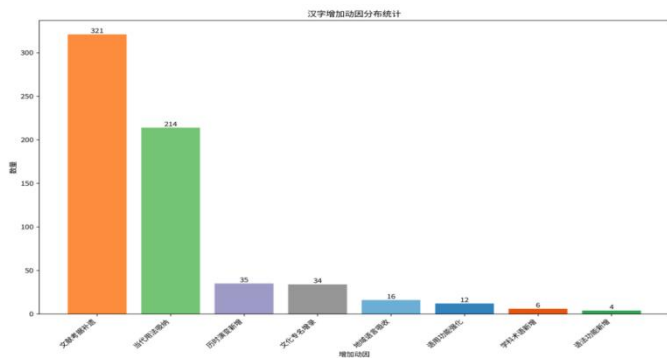


图3 新增义项动因分布柱状图

2.3.1、语言内部动因

语义扩展：词义从原有意义，通过引申，比喻，联想等方式，延伸出新的意义。这一过程受语言经济性，认知关联性以及使用频率固化的影响。如“下”的“鄙视”义：本义为“位置在低处”，隐含“低下”色彩。汉语常用空间高低隐喻地位价值，如《礼记》“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老子》“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这些文献中“下”常与“卑贱”关联，逐步引申为“品行、地位卑贱”，再转化为对人的“轻视、鄙视”态度。“下人”“下视”等结构反复强化这一用法，使“鄙视”义固化为“下”的独立词义。

语法化：语法化是指实词逐渐变成虚词或其他语法成分，同时产生新的语法意义的过程。词的功能发生转移，高频句法位置逐渐固化，语义不断虚化，实词的实在意义慢慢变淡，语法意义则不断增强，最终形成独立的语法义项，使得一个字既保留原本的实词义，又新增了新的语法义。以“甚”字为例，其本义是形容词，表程度深、过分、厉害，如“甚急”“甚好”，此时它是纯粹的实词，仅仅表示程度，不具备疑问功能。在中古汉语及近代汉语中，“甚”频繁出现在疑问语境里，最初的结构为“何等事 + 甚”，如《晋书·刑法志》“此何等事，而乃甚乎！”，高频使用后，结构紧缩为“甚事”（《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甚”从句末补语前移到名词前作定语，句法功能发生质变。到唐宋时期，“甚”开始向疑问代词过渡，至元明时期，彻底脱离程度义，直接表示“什么”，语义虚化后被重新分

析为疑问代词。后世为区分原形容词“甚”和新疑问代词“甚”，造“什”字专门表示疑问义，因此今天“什（什么）”的疑问功能，源头就是“甚”的语法化。

通假弱化：古代用字不严，常以音同或音近字通假本字。后世用字逐渐规范，通假现象减少，但通假时所承载的意义多被保留下来。随着通假义独立化、文献用例长期沉淀，最终推动字典新增义项的形成。以“琢”为例：“琢”本义为治玉、雕刻玉石，是本字；“砣”从石，本义与石击、雕琢相关，二者音近，古籍中常以“砣”通假代“琢”。这一用法长期稳定出现，如汉《校官碑》“如切如磋，如砣如磨”，《礼记·学记》日本古钞本、朝鲜刻本异文“玉不琢，不成器”，《篇海类编·石部》亦载“砣……同‘琢’，治玉也”。后世用字规范后，“砣”不再随意通假“琢”，但其通假阶段形成的“治玉、雕琢”义已被文献固定，不再依附通借关系，直接成为“砣”自身的稳定义项，因此在字典修订中被正式新增。异体，俗字，讹字的义项归并：《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吸收俗字、异体、讹字研究成果，将分散义项归并、补全。汉字书写变异导致义项分散，校勘与字际关系研究推动整合，一批俗字，异体字的用法被考证，补充为正字的义项。如：“朗”同“朗”。朗不等于朗的本字，是俗写，讹写，异体。朗：《说文》从月、良声，本义明亮、清朗，正字。朗：从刀、良声，《说文》未收，属后世俗字/讹字/异体。朗，同朗（《康熙字典》）。在隶书，楷书里，月（月）与刀（丩）字形极近，手写极易互讹。朗（良+月）在抄写，刻写时，月旁误作刀旁，遂成朗（良+刀）。朗（lǎng）、朗（lǎng）读音完全相同（卢党切/卢坦切）。音同加上形近，为“朗”代“朗”提供了替换条件。刀旁（2画）比月旁（4画）更易写，以简代繁，形成稳定俗写。另有古籍书证中证明通用。如：“耳聽滔朗奇麗激疹之音”（《淮南子·原道训》）朗等于朗，指声音清朗、响亮。“抑揚爽朗，莫之與京”（《笺注陶淵明集·序》）朗等于朗，指文辞清朗明快。“朗”由“朗”的月旁讹为刀旁形成，属形近讹字，俗写异体；因音同、义同、长期通用，后世字书将其义项完全归并入“朗”，最终确立“朗，同朗”的规范认定。由于字的构造也会产生异体字和俗字。这种异体字常见的特点是结构互相置换。例如，“此”字在《冠军将军刘氏墓志》中刻为“𠄎”，《宁懋墓志》中将

“房”字刻为“𠂔”等。这种结构置换可能是由于书者对字形结构的理解不同，或者是为了书写方便而进行的调整。

2.3.2、外部社会文化动因

科技发展：科技发展是《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新增义项的重要外部动因，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普及，使大量传统汉字被赋予新的科技含义，成为义项增补的重要来源，填补了科技发展带来的语义空白，反映了科技对汉语词汇系统的深刻影响。如“帕”新增义项“帕斯卡的简称，压强单位”：其本义是手帕、头巾。帕斯卡(Pa)是1971年确立的国际标准压强单位，1984年我国明确采用该单位并淘汰旧单位，广泛应用于工程、物理、医学等领域。“帕”作为其简称，在口语和书面语中高频出现(如“1帕”“千帕”“帕斯卡定律”)，从外来音译词变为稳定单字义项，《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据此收录该义项。再如“翼”新增义项“飞机等飞行器两侧伸出像鸟翼的部分”：其本义是鸟的翅膀，飞行器的侧升力面在形态、功能上与鸟翼高度相似，故沿用“翼”命名，形成“机翼”“尾翼”等高频搭配，经航空出行与科技传播，该用法从临时借代变为稳定词义，被正式收录。还有“艇”新增义项“排水量在500吨以下的军用船只；潜艇不论吨位大小，均称艇”：其本义是轻舟、小船，与“舰”形成大小对立。1975年《海军军语(试行本)》明确军用船吨位分界，500吨以下水面军用船及各类潜艇统称“艇”，导弹艇、核潜艇等高频使用该称谓，用法稳定后成为新增义项。

方言进入通语：方言进入通语之所以造成义项新增，是因为方言为汉字提供了普通话不具备的新用法、新意义，这些用法经社会传播被全民接受后，需要在字典中独立设项，以反映现代汉语真实的词义系统。如“纠”新增动词义“拧”：《说文解字》中“纠”本义为“绳三合也”，核心是绞合、缠绕(如“纠缠”)。在四川、西南官话及部分官话区，“纠”长期作为高频口语动词，表“用手拧、扭、绞”，如“把瓶盖纠紧”“把毛巾纠干”，覆盖上亿人口，使用稳定。现代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如李劫人《大波》“郝又三正待伸手纠他的脸”。相较于普通话“拧”的多音多义，“纠(jiū)”读音单一、指向明确，可避免歧义，最终成为独立义项。再如“踮”新增字义“方言，踢到”，主要通行于以北京话

为核心的北方方言区，口语使用频率高，如老舍《骆驼祥子》“他脚底下一滑，踮在门槛上，差点摔出去”，其用法经传播固化，成为规范义项。

民族政策：民族政策推动民族名称规范化、法定化，使原本不通用、写法混乱，甚至带歧视的字，变成全国通用、必须书写、必须读音的规范用字，词典必须为它们新增专用义项。国家确认各少数民族为法定民族，民族名称从民间称谓变成国家正式名称，必须有固定汉字。(如：“傣傣”)。同时过去很多民族用字带“彡”“夷”等歧视偏旁，或写法混乱，《汉语大字典》作为权威工具书，必须反映国家语言规范，体现民族平等，满足社会使用需求，因此必须新增义项。以“傣傣”为例，“傣”“傣”原本为生僻字，无通用义。新中国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开展民族识别，20世纪50年代正式确认傣族为单一少数民族，国家民委、语委统一规范“傣傣”为唯一法定写法，废除“栗栗”等异体字，其在行政、教育、媒体等领域高频通用。《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据此新增专用义项：傣、傣均用于“傣族”。此外，“怒”新增义项“我国少数民族名，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满”新增义项“我国少数民族名”，均是民族政策推动下的义项新增。

文献考据新发现：文献考据的新发现是《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新增义项的重要学术动因。第一版《汉语大字典》主要依据常见古籍、经史子集，很多字的古义、僻义、假借义没有被发现或证据不足，只能缺注、误注或不立义项。而后世出现大规模新材料与新考据，包括：出土文献，古籍新整理、方言，民族文献新校勘，大量传世文献未载、旧注疏漏或误释的汉字古义、僻义、假借义与专用义得到实证。《汉语大字典》第二版补立过去缺失的义项，纠正旧误释义，补充新的假借义、古义、专用义，于是就出现了新增义项。如：“伎”新增“古代指百戏杂技艺人”意，“凄凉蜀故伎，来舞魏宫前。”(《后汉书》)第一版主要依据《说文》“伎，与也”的本义与后世通行的文献，将“伎”的核心义项定为“技能”“歌舞女子”，未区分“歌舞”与“百戏杂技”的职业边界，对汉唐“百戏”体系下的“伎”缺乏专义收录。近现代对《后汉书》《通典》等典籍的校勘与训诂，明确了“伎”在汉唐语境中可统摄歌舞、杂技、角抵等所有表演艺人，并非仅指女性歌舞者。如《后汉书·仲长统传》“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含百戏杂技)，《南史·宋

废帝纪》“作羌胡伎为乐”（指少数民族杂技表演）。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补证“伎”通“技”的表演义，近现代训诂进一步区分“伎”的“技艺”本义与“百戏艺人”的引申义，纠正了首版将二者混同的问题。古籍整理与训诂新证通过挖掘传世文献中的百戏书证、辨析“伎”与“妓”的历时分化，证实“伎”在汉唐时期确有“百戏杂技艺人”的专义，促使《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新增该义项，实现了汉字语义的精准化与完备化。“羴”新增“剽悍”意。第一版仅依据《说文》《玉篇》《急就篇》等基础字书，将“羴”限定为动物义：阉割过的公羊（騾羊、犍羊），母野羊（西方野羊之牝者），未收录其形容人性情剽悍的引申义，没有系统梳理《史记》等典籍的语境用例与古注互证。“其民羯羴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僇悍”（《史记·货殖列传》），描述赵国、中山一带民风，“羯羴”与“僇悍”对举，明确指民风强悍、桀骜不驯。徐广在《史记集解》中点明：“羴，健羊名”，“羴”本指健羊，引申为人性如健羊般剽悍。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言其方人性若羊，捷捍而不均也”直接释“羴”为捷悍、剽悍。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很如羊也”训“很”为不听从也，坐实“羴”^[4]的引申义理据。第二版中拆分“羴”的义项，明确区分了动物本义和形容引申义，纠正了首版语义缺失，既可以指健羊，也可形容剽悍的民风与人。“禳”新增“香囊”义。晋·傅玄《西长安行》：“何用存问妾，香禳双珠环。”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物异》：“晋时有徐景，于宣阳门外得一锦麝禳。”“禳”不见于《说文》《玉篇》《集韵》，属于后起字，其“香囊”义仅存于中古至唐宋文献，属于文献新证。此前字书仅存“毛带”义，诗文与笔记提供了“香囊”的名物用例。“醋”新增“据《封氏闻见记·蜀无兔鹅》：“酱菜似殖火，若象豆屑、胡芹、澤瀉葉之屬，並自西域而來，色類甚衆。”义。是依托《玉篇》《集韵》的字书训诂，及唐代饮食文献《封氏闻见记》的新考据。

三、删减义项的分布与动因分析

通过上一个部分对于《汉语大字典》第一版和第二版的新增义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影响字词发生义项变化的动因是十分多样的，同时汉语字词本身丰富的语义组合也影响着变化类型的多样性。至于删减义项部分的分析，将会继续沿用类似的分析模式以求对照效果更加明显。

（一）删减义项的类型分布

通过对比两版汉语大字典，共得到 96 条具有分析价值的删减义项变化。其中变化类型以“整义项删除”为主，共计 69 条，占删减总数的 71.88%；其次是“修饰语删除”，共计 16 条，占删减总数的 16.67%；之后为异体字或通假字删除，共计 11 条，占删减总数的 1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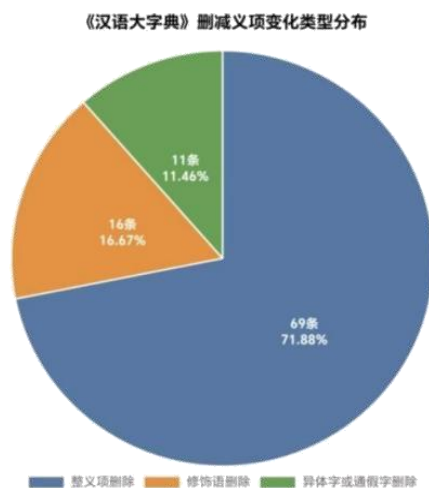


图4 删减义项类型分布柱状图

（二）删减义项的类型分析

从删减义项的三种分布类型何变动内容上来看，极少存在整字义项发生完全淘汰式的改变，绝大多数都是温和式的渐进式的变化。在这些删减变化中，以整义项删除为主，此处的整义项指的是某字的其中之一完整的释义。例如：“一”字的其中之一释义为“相同、一样”，那么“相同、一样”为“一”字的其中一个整义项。在“相同、一样。”之后的“如：长短不一、一视同仁”这部分内容为修饰语。分类中的第二个部分修饰语删除便是对这部分对于释义补充说明内容进行了删减。至于第三个类型异体或通假删除，便是对于字际关系的梳理，对于异体关系加以沟通，本质上是对记录汉语的文字符号不统一的现象进行整理^[5]，很少涉及字义本身的变化。

在上述三种形式类型的基础之上，还可以根据具体删减的内容再次将其归类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历时元素的当代筛选、语义系统的内部调整、释义科学性和规范性的提升、辞书编纂体例的优化。

3.2.1、历时元素的当代筛选

此类删减内容的核心特征是被删内容往往是

极度生僻的死字、死义，不具备当代的使用价值。例如：“初”字的其中之一释义为“鼻”，这与当代人的使用习惯完全不同，并且现有“鼻”本字可以更好地契合这一义项，这便是典型的死义被删减。再如：“璩”字的第一版释义为“玉色”，第二版释义则为“同‘璩’”，“璩”继续表示“玉色”一义，而“璩”字作为“璩”的异体字，因为其书写繁杂和其他历史原因已经变为极少用的死字而被删除义项。

3.2.2、语义系统的内部调整

此类删减内容的核心特征是被删内容大多是具有多个释义的汉字内部的释义整合、调整；或者在异体字、通假字等字形字际关系曾经存在意义关联但现在联系弱化的汉字。例如：“坑”字的其中之一释义为“坐床”，俗作炕。而“坑”已经不具有“坐床”的意思，同时“炕”取代了“坑”来继续表示“坐床”的意思，这正是一个因字际关系调整，由形近汉字取代本字的表意而被删减的例证。再如：“滄”字的第一版其中之一释义为“以石垒小堤不让水分流”，而在第二版中释义则变为了“水流不动”，而“滄”字本身还具有“水无波”这一释义，也就可以发现“滄”字的意义就与水流的状态密切相关。那么由第一版的“以石垒小堤不让水分流”删减为第二版的“水流不动”，就是围绕着水流的状态进行了字词语义的整合和调整。

3.2.3、释义科学性和规范性的提升

此类删减内容的核心特征是被删内容主要是由于原先的字词释义不严谨、不规范、不科学而无法适应辞书严谨性的要求或由于时代发展，该字词不再指代此类概念而进行的删减。例如：“刺”字的第一版其中之一释义为“围棋的一种战术，连子直入曰刺”，第二版就对这个释义进行了删除。结合第一版的释义内容“连子直入曰刺”，可见“刺”字的“围棋战术”意是由于棋子在棋盘上的形式表现、动作态势符合“刺”字的本义，所以用“刺”字来命名此类的围棋战术，这样的命名方式基于直观的观察，往往未能说明其本质特征，并不科学，也不规范。再如“衡”字的第一版其中之一释义为“北斗杓三星，玉衡的省称”，第二版中将此释义进行了删除。北斗七星分别是“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其中后三位又称北斗杓三星，意为斗柄处的三颗星，玉衡星位于斗柄的首位，是连接斗身（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和斗柄（玉衡、开阳、摇光）

的关键位置，是北斗七星轮廓的核心所在。故而，用“衡”来简称玉衡星，也是在利用“衡”字本身具有“平衡、平正”的本义，并非因其玉衡星本身的“衡”字属性，所以第二版对该释义进行了删除。

3.2.4、辞书编纂体例的优化

此类删减内容的核心特征是被删内容是为了适应辞书编纂的种种原则而进行了舍弃和合并的。这些编纂的原则中最常见的、最具代表性的是释义经济性原则，即尽量简洁地表达字词释义。例如“言”字的第一版其中之一释义为“说话；说，讲。”，第二版对应的释义表达为“说话；说”，将第一版中的“讲”进行了删减，正是因为“讲”义与“说”存在重合，根据辞典释义的经济性原则，将“讲”舍弃掉了。再如：“射”字的第一版其中之一释义为“古代六艺之一。有关弓箭制作规范和使用技能的训练。”，第二版的对应释义则是“有关弓箭制作规范和使用技能的训练。”，删去了“古代六艺之一。”这个部分，也是因为前一部分的解释与后一部分解释存在重合，所以只保留核心意义，将社会地位等冗余描述删去。

（三）删减义项的动因分析

在现收集的96条语料之中，我们按照动因来看，可以大致分为：语义磨损与替代、通假机制弱化、社会文化变迁、释义经济性原则四个主要动因。当然了，一个字词含义的减少一定是长期的磨损过程，并且在其中伴随着语言内部和社会环境的多重动因，在把握和界定一个字词的变化动因时，往往是多元丰富的，不可以孤立地仅仅观察这一字词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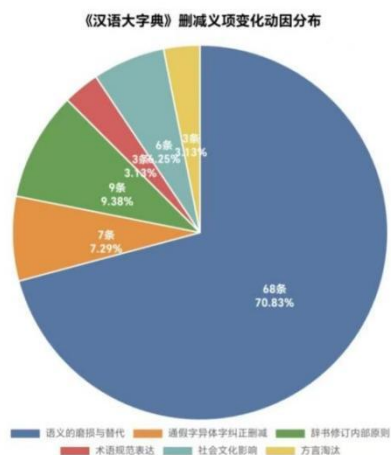


图5 删减义项动因统计饼状图

3.3.1、语义磨损与替代

语义磨损：指语义在使用中会产生磨损的一

种新兴语法现象^[6]。该义项所承载的语义随语言发展逐渐淡化，使用频率持续降低，核心义素不断流失，不再具备独立存在的语言价值，成为词汇系统中的边缘语义。语义替代：新的词汇形式逐步承接该义项的表达功能，在交际中形成固定使用习惯，原义项对应的表达形式被自然取代，语义功能被新词汇完全覆盖，最终失去保留的必要性。例如：“言”字被删除的“讲”义。“讲”的语义更偏向“详细阐述”或“特定场景表达”，与“言”偏书面化、简洁化的表达。不属于“言”的核心语义范畴，删除后可让义项更聚焦核心义，避免语义混淆。先秦时期“言”是高频动词，如《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可独立表“说话”；但随着语言演变，“言”逐渐向名词或书面语固定搭配转型。当代语境中，“言”作为独立动词已极少使用，且与“讲”的使用场景完全分离，如“言故事”不是规范表达，“讲故事”才是，删除“讲”是对二者功能分化的客观确认，符合词汇发展的自然规律。将二者语义剥离，是基于“言”本身的“讲”义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被磨损了，并且“讲”义可以用新的字词来替代。同时，这样的删改也有利于学习教育，对非专业用户而言，“讲”是高频口语词，“言”是低频书面词，二者在日常使用中几乎无交集，保留“讲”易让学习者混淆。删除“讲”后，义项简化为“说，说话”，直接指向“言”的核心功能，降低了学习门槛。

3.3.2、通假机制弱化

对于通假机制弱化导致的删减，可以再划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通假关系消解：该义项对应的通假用法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随着语言规范化发展，原有的通假对应关系逐渐被标准化用字取代，在现代汉语体系中不再被认可和使用。其次是语义独立：通假字与本字的语义在发展中逐渐分化，各自形成独立的语义体系，二者的关联度持续降低，通假义项无法融入现当代的语义表达逻辑，成为冗余语义。

例如：“幹”字被删掉的“通“管”，主管。”义。“幹”与“管”并不存在广泛认可的通假关系，现代工具书不再标注“通管”，核心原因是所谓通假本质是古代个别语境的临时借用或用字混淆，未形成稳定通假传统，且随着文字规范化进程被逐步厘清。从字词本身意义来看，个别古籍中“幹”表“主管、从事”义，如《后汉书·伏湛传》“欲令幹任内職”，被误认作“管”的通假，但这是“幹”自身的本义引申，从“主干”

义引申为“主持、担当”义，并非替代“管”。此外，在中古音系统中，“幹”属“古案切，去声，翰韵。”，声母为见母；“管”属“古满切，上声，缓韵。”，声母同为见母，但声调、韵母存在差异，不符合“同/近音通假”的核心条件，从音韵演变来看，二者古音距离较远，缺乏通假的语音前提。因此，可以判断“幹”字与“管”字不存在稳定的通假关系，可能是某些古籍的错误使用影响了第一版辞书编纂过程，随着训诂学等学科的发展，在第二版的修订过程中予以了改正。

3.3.3、社会文化变迁

被删减的义项所关联的文化内涵、社会场景随时代发展逐渐消失或转型，其语义表达与现当代的社会文化语境脱节，无法在当下的交际中发挥实际作用。同时，社会文化的发展推动相关语义场发生重组，该义项所在的语义范畴被新的文化概念和表达形式重构，原有义项被挤出主流语义表达体系，失去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例如：

“音”字被删减的“歌谣”义。社会文化角度来看，现代音乐形式，如流行音乐、电子音乐更依赖“音”的技术属性，而“歌谣”作为传统艺术形式，其文化价值更多通过“民歌”“非遗”等概念体现，与“音”的现代用法渐行渐远。同时，现代科技：声学、电子学等领域的术语，如“音频”“音波”占据了“音”现代用法，挤压了“歌谣”的语义空间。再看字词本身的发展，“歌谣”的核心义素是“口头传唱的韵文”，其音乐性依附于歌词内容，与“音”侧重纯乐音的属性形成对立。第二版删除“歌谣”，实为将“音”的语义场收缩至“无歌词的音乐形式”。此外，“歌谣”作为双音节词，已成为独立的语义单位，而“音”单用时更多指向抽象音乐概念，“音色”“音高”。这种分化在《广韵》等古代韵书中已见端倪——“音”注为“声也”，“歌”注为“咏也”，二者已经分属不同语义范畴。再如：“語”字被删减的“汇辑一时、一人的事迹和言论的书名。”表示“汇辑言论的书名”时，“语录”（《论语》）成为专用词，“语”作为语素与“录”（记录）结合，既保留“言论”义，又明确“汇辑”属性，语义更完整；表示“汇辑事迹的书名”时，“行状”“别传”等词承担此类表意功能，与“语”无关联。这种发展态势使“語”单独表示“汇辑类书名”的用法失去存在空间，语义功能被细分到其他词汇中，最终导致该义项因冗余被删除。

3.3.4、释义经济性原则

辞书学释义的经济性原则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看。分别是语义重叠：该内容所表达的语义已被同一词条的核心义项或其他相关义项涵盖，无独立的语义信息增量，保留易造成释义的重复与赘余，影响语义表达的简洁性。以及体例适配：从辞书编纂体例来看，该内容属于非核心信息，删除后可使词条的释义结构更清晰，层级更分明，符合辞书对信息筛选、提炼的基本要求。例如：

“说”字的第一版其中之一释义为“旧时指说合，介绍。”，第二版的对应释义为“说合，介绍。”，将第一版释义的“旧时指”进行了删除。“说合”的核心义素“从中促成双方关系”在现代汉语中未发生本质变化。从历时角度看，该义项在《世说新语》等文献中已有记载，如“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并延续至今。尽管社会婚恋形式从“父母之命”转向“自由恋爱”，但“说合”仍在婚姻介绍、商业合作等领域保留其功能，如“说合亲事”“说合项目”。第一版标注“旧时指”误判了该义项的存续性，而第二版删除标注，是对其语义稳定性的确认。“说合”的核心用法（婚姻介绍）仍是其语义范畴的原型，而现代衍生的用法属于边缘用法。第一版标注“旧时指”可能将原型用法固化为历史现象，忽视了边缘用法对原型的反作用。第二版删除标注，反映了字典编纂对“说合”语义范畴开放性的认可，即原型与边缘成员共同构成完整的意义网络。因此，将“旧时指”这部分修饰语删去表现了辞书编纂的科学性和经济性原则。

四、修订机制的理论探讨

（一）词典修订反映汉语词汇系统的自我净化与优化

汉语词汇系统的自我净化与优化，在《汉语大字典》的修订中通过具体的义项增删数据得到实证性呈现，其核心表现为“低效语义淘汰”与“语义体系完善”。

从语义净化的角度来看，修订通过精准删减实现词汇系统的去冗余。两版对比共梳理出96条有效删减义项，其中整义项删除69条，占比71.88%，核心为历时元素筛选出的死字死义与语义重叠内容。例如“初”字第一版中“鼻”的义，因“鼻”本字已完全承担该语义功能，且该通假用法在现代汉语中零使用，属于典型的冗余语义被删除；“璩”字第一版“玉色”义，因自身为“璩”的异体字，书写繁杂且使用频率极低，第二版直接归并为“同‘璩’”，删除独立义项。这种删减并非随机取舍，而是对词汇系统中低效、

过时语义单位的清理，符合优胜劣汰的自我净化规律，使汉字的语义指向更集中。

从语义优化的维度来看，642条新增义项通过填补语义空白、细化语义分工，推动词汇系统的结构化升级。新增义项中，引申义占比最高。如“下”从空间概念延伸出“鄙视”义，“升”从具体动作扩展为“晋升”义，形成完整的语义链条；学科术语新增义项16条（占比2.5%），如“帕”新增“帕斯卡”压强单位义、“翼”新增飞行器部件义，填补了科技发展带来的语义空白。同时，词汇系统的经济性原则在修订中充分体现，“塑”字新增“塑料材料”义，使同一字形承担动作与材料双重语义，避免了新字创制，实现了语义资源的高效配置。这种基于内部规律的义项增补，使汉语词汇的语义网络更严密。

（二）从“描写性”到“规范性”的辞书功能转变

《汉语大字典》的修订清晰地呈现了大型语文辞书从客观描写语言事实到描写与规范并重的功能转型，这一转变通过具体的修订数据与实践操作得以落地，是在尊重语言现实的基础上，提升辞书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第一版的编纂以描写性为主，侧重记录汉字在历代文献中的使用原貌，未对不规范现象进行干预。释义方面，“刺”字第一版标注“围棋的一种战术，连子直入曰刺”，该释义基于直观动作描述，未揭示战术本质，缺乏科学性；在术语使用上，方言字释义中“别称”与“俗称”混用，体例不统一。这种纯描写性处理虽保留了语言的原始状态，但难以满足读者对规范信息的需求。

第二版修订显著强化了规范性导向，通过数据优化与学术考证实现规范引导。释义方面，删除“刺”字不科学的围棋战术义，新增学科术语均明确科学定义，如“酸”界定为“电离时产生的阳离子全为氢离子的化合物”；术语使用上，统一方言字释义术语，将“姐”的“别称”修订为“俗称”，使方言字的释义体例保持一致。此外，第二版删减16条修饰语（占删减总数的16.67%），如“言”字删除“讲”义，避免语义重叠，体现了释义的经济性与规范性。这种转变表明，当代大型语文辞书已从单纯的语言记录工具，转变为兼具描写真实性与规范引导性的权威参照。

（三）修订中体现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意识

《汉语大字典》的修订深度契合国家语言政策，其642条新增义项与96条删减义项的处理，

贯穿了规范汉字推广、术语标准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的语言规划目标,体现了辞书编纂的社会职能。

在规范汉字推广方面,修订严格落实《简化字总表》的类推简化原则,针对第一版中“車”“門”等偏旁类推简化不一致的问题,第二版逐步统一标准,补充类推简化形式,减少繁简混用造成的检索障碍。这种处理直接响应了推广规范汉字的国家政策,推动汉字使用的标准化。

在术语标准化方面,新增的16条学科术语均依据国家学科术语标准审定,如“乏”作为电工学术语 var 的标准译名,“域”的“网络域”定义,实现了与国家标准的对接;方言字释义中,统一“称类”术语,推动了方言研究领域的术语规范,契合语言规划中“术语规范化”的目标。

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方面,修订通过语音标注与义项调整引导方言向普通话靠拢。以“刻”字为例,其方言音 kē i 不符合汉语拼音方案,第二版虽保留该义项,但明确标注为方言音,同时优先标注普通话读音 kè;“量”字的轻声化标注(liáng→liang),区分“测量”与“打量”的语义差异,契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范。此外,在民族政策推动下,“傣傣”“怒”等字新增民族名称义项,规范了民族用字,体现了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导向。

五、结论

5.1、核心研究与创新价值

本研究通过全量统计分析《汉语大字典》一、二版间642条新增义项与96条删减义项,得出核心结论:其一,义项增删呈现优化为主、净化为辅的特征,新增聚焦引申义补充、当代用法吸纳与文献考据补遗,删减以死字死义汰除、语义系统优化为核心,是汉语词汇系统自我净化与优化的外在体现;其二,辞书功能实现从“单纯描写语言事实”到描写与规范并重的转型,第二版通过释义规范、术语统一、注音校正,强化了权威工具书的规范引导职能;其三,修订深度呼应国家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在规范汉字推广、术语标准化、民族用字规范等方面充分体现了辞书编纂的社会职能。

本研究的创新点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系统性,首次对两版义项增删开展全量穷尽式分析,建立多维度封闭性数据库,突破现有研究零散订正的局限;二是动因分析的双重性,结合语言本体内部规律与外部社会文化动因解读修订逻辑,实现二者有机结合;三是研究结论的实证性,所有分析均基于具体修订数据,结论精准且有明确支撑,可为辞书修订提供实际参考。

5.2、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受数据可得性限制,研究仅聚焦义项增删核心维度,未涵盖字形修订、书证调整等内容;样本覆盖仅针对有义项变化的条目,对无修订字头缺乏探讨,难以完整呈现词典修订全貌;未追踪义项增删后的社会使用反馈,缺乏对修订实践效果的后续验证。

基于研究结论与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从两方面推进:一是完善《汉语大字典》后续修订工作,深化语义系统优化,淘汰冗余义项、补充新兴语义与弱势方言区义项;强化规范引导职能,统一释义术语体例、结合最新国家标准更新学科术语;完善文献考据支撑,吸纳出土文献与古籍整理新成果,增强释义严谨性。二是推进数字化辞书编纂建设,构建义项演变动态修订数据库,实时追踪新词新义,补充缺失的信息,探索语义拓展,系统化整合知识^[7];开发多模态规范模块,为方言字、专业术语等提供语音、图像、文献等多元资源;搭建用户反馈闭环,形成“反馈-考证-修订”的迭代机制,提升辞书的时代适应性与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 [1]洪成玉.词义的系统特征[J].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04):1-11.
- [2]曲丽玮,林明明.近五十年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06):200-201.DOI:10.16227/j.cnki.tyccs.2013.06.015.
- [3]付慧琳,李俊.汉语词汇词义可变性初探[J].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14,12(03):149-151.DOI:10.13895/j.cnki.jimufe.2014.03.002.
- [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02.
- [5]雷汉卿,刘珂鑫.《汉语大字典》字际关系问题综论[J/OL].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1[2026-03-08].<https://doi.org/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50926.001>.
- [6]刘扬之.词语误用与语义磨损浅析[J].科学咨询(教育科研),2020,(42):40-41.
- [7]姜永超,黄仁瑄.专题数据库建设与《汉语大字典》的修订[J].汉字汉语研究,2024,(02):47-57+126.DOI:10.13513/j.cnki.41-1041/h.2024.02.007.